



顾梦圆

贤人的智慧

中学
必读书库

知

中学生必读书库

贤人的智慧

(下)

顾梦圆

知 识 出 版 社

第五章 知识与智慧

学习的目的在于创造完美的人格

中国文化开创时代的哲学家多是颇孚声望的教育者。他们的学说对道德、自我心情的注重，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教育模式。

孔子说：“君子不应当像器皿一样，只有一定的用途。”

他的意思是，君子所以为君子，并非只有一技之长，更重要的是道德力量的无所不在，是完美人格的健全和丰富。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作为教育家的孔子对学习知识所采取的态度。

《论语》中，孔子经常评论他的学生，但孔子所肯定和赞扬的，不是他们的博学和心智聪明，更多是学生的德和仁，即人格的修养。

有次，鲁哀公问：“你的学生中，哪个好学？”

孔子神色黯然地回答说：“有一个叫颜回的好学。他自己不高兴了，从不迁怒别人，他善于自省，从不会犯同一个过失。但他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

孔子所谈及的好学，是颜回良好的人格素养，这足以可见其对培养人格的注重。

应当说，孔子的见解是极为深刻的。对于求知而言，最根本的目的是培养心性，即使是极其实用的知识，尽其能而为社会服务，得到的亦是心理的和谐和满足，何况，人格的修养本身也包含着智慧，而智慧是遗忘了所有知识后仍存留的东西，是创造完美人格所应具备的条件。

中国文化以为，那种单纯为了成名、取利而求知，不是学习知识的大道，它常常会走向被人耻笑的尴尬。

《庄子·列御寇》中曾讲过这样一个寓言。

有个叫朱漫坪的人，一心想学技成名，飞黄腾达。他想一鸣惊人，于是变卖了所有的家产到很远的地方，拜一个叫支离益的人学习屠龙的技艺。

苦苦学了三年，终于学成。回来后，很兴奋地给人讲他如何杀龙。

那时，有人笑问：“什么地方有龙可杀呢？”

这个寓言意在告诉我们：学习知识要注意实用性。知识和技能是必要的，但纯粹为追求一鸣惊人的荣耀，终是与学习知识的目的相去甚远的。

对于学习的目的，庄子与孔子有所区别，但也有相通之处。孔子认为学习是人格修养的创造。庄子则从其学说的要义出发，主张抛弃俗世之用，求取知识当是为了充盈自己的精神境界。

庄子说，一般人的心智，只够劳疲精神于浅陋的事，这是不懂得精神的纯正自然。心智拘泥在毫毛小事上，去求得一些外在的皮毛知识，这是永远达不到大宁境界的。

庄子所言的大宁境界，乃是个体生命精神的自由。

放眼现代社会，庄子的主张更富现实意义。现代知识的

高度密集，已使人们为了在社会上求生存，被迫接受比过去多几倍乃至十几倍的知识，这是我们进化的文明所必需的。但是，对德的教育与培养日渐减弱，所以，人格的力量必得有不凡的毅力方能保持不失。相对而言，人暂时忘掉被庄子称为“毛皮”的知识是容易的，但精神的超然却是种难得的解脱。

理应引起现代人类注意的，倒是学习目的改变所导致的人格成长的艰难。人类对知识和科学的自信是好事，但是否它们真的就可以无所不能地顺利解决人类心灵所遇到的众多麻烦呢？对此未必值得乐观。

为人师者应以其人格 去感化教育别人

对培养人的道德，古代哲人的看法几乎是一致的。他们都坚信身教和潜移默化是唯一途径。

这方面，儒家堪称典范。

曾子是孔子门下学有所成的弟子。在孔子死后，弟子们守过三年孝期后纷纷离去。因曾子相貌与孔子相若，不少学生愿意以对孔子之礼待他。他坚辞不受。不过就继承孔子学说而言，曾子亦算是不负师望的。

《韩非子·外储说》曾记有这样的故事。

有次，曾子的妻子上街，小儿子哭闹着要跟她去。曾子妻子就说：“你先回去，回来给你杀猪吃。”

等她从街上回来，见曾子正捆了猪要杀。

妻子忙阻止说：“你干什么呀！我不过是骗骗小孩子的。”

曾子正色地说：“怎么能欺骗小孩呢？他现在还什么也不懂，只会学父亲、母亲。你现在这样欺骗他，是教他也学会骗人。做母亲的欺骗儿子，做儿子的不相信母亲，这还能教育吗？”

说完，就把猪杀了。

曾子深知教育者的修养和品德，对学生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为人师者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处世立身的人格。这是为师者之德，也是为师者之道。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发愤忘食，乐而忘忧，栖栖惶惶，以拯救苍生为职责。他至诚至韧的伟大性格和精神，对其弟子以及后世都影响至深。

孔子之于弟子极为重视身教。孔子说：“本身行为正当，不发命令，事情也行得通；若是本身行为不正当，虽命令也没人听从。”一部《论语》也多是教育学生品德的记录，《论语》记述孔子的教育科目有四：文、行、忠、信。

忠、信是培养人的动机；文、行是指行为的训练。孔子所教的是知行和修养方面的知识，其内容就是孔子用以修身养性的手段，把这些告诉他人，指示他人，这就是所谓的教育了。

所以，当时四方闻风慕德而就教者无计其数。据《史记》记载，孔子有弟子三千余人，贤者七十二人。孔子具有那样的人格，又博学多能，所以连被称为“十哲”的高足弟子（德行：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由、子路；文学：子伋、子夏）也只能修养到孔子人格的一部分。

孔子对弟子极诚挚，他的人格感化能力又极宏大，所以

弟子尊敬孔子也异乎寻常。

子贡说：“别的贤者像丘陵，尚可以登上去。仲尼，是太阳和月亮啊！”

子张说：“难以赶上先生，就好像不可用台阶登天一样。”

得益于孔子影响的孟子，也是以其人格的卓绝而影响后世的人物。

《孟子·尽心》记述过这样一件事。

孟子在滕国时，国君的弟弟滕更曾到孟子门下学习。孟子不回答他的问题，也无什么教诲。

弟子问起原因，孟子说：“倚仗自己地位来发问，倚仗自己的贤能来发问，倚仗自己有功劳来发问，倚仗自己是老交情来发问，我都不回答。这中间，滕更占了两条。”

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孟子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富贵所动的人格和品质。

知识与行动应该合二为一

孔子说：“书本上的学问，大约我同别人差不多；在生活中的行动，我还没有很成功。”

这是孔子的肺腑之言。

孔子从人格的意义出发，对行的价值是非常注重的。在孔子，知识与行动相连，知识的培养是为了实践和行动。他注重仁、教以礼，最终是为了实现他恢复上古帝王之制的目的。他也正是因此而周游列国的。

的确，就恢复古制的行动而言，孔子并未取得多少成功。他所任最大的官职是鲁国的司寇，干了两个多月，由于不满

意鲁君的荒淫而去。他最成功的政治活动是齐鲁两国国君会盟时任鲁国的相礼。但无疑，孔子对行的价值的注重和以知识的求取培养仁德、进而直接施行于社会的主张，对后世儒学的发展是有影响的。

实际上，在先秦诸子中，重视以知养性，以完善道德为基点，希望得君行道以救世，几乎是共同一致的主张。

当时与儒学相抗衡、被称为显学的墨家，在这方面与儒家相比，走得甚至更远一些。

它的开创者是鲁国的墨子。

墨子做过车工，研究过筑城、器械，对力学、光学都有丰富的知识。墨子对知识的注重不仅仅因为他是个实干家，而是因为他认识到知识是其实现学说的必备手段。换句话说，是其学说的延展。

关于墨子，曾有过这样一件事。

强大的楚国请著名的工匠公输班造了云梯，准备攻打弱小的宋国。

墨子听说了，走了十天十夜赶到了楚国。他找到公输般，并一同去谒见楚王。

当着楚王的面，他们进行演练。墨子解下自己的腰带做城墙，用筷子做守城器械。结果公输班设计的多种器械都被挫败。

公输般说：“我知道有个办法可以挫败你，但我不说。”

墨子说：“我知道你挫败我的方法是什么，我也不说。”

楚王很迷惑，就发话要求两人说明。

墨子说：“公输般的意思是大王只要杀了我，没有人帮助宋国守城，就可以进攻宋国。我知道这个方法，我的弟子他

们已经带着器械到了宋国，在城墙上等着楚国的进攻哩！”

楚王于是放弃了攻打宋国的计划。

这件事，是墨子以知识为手段，实行其学说的典型事例。

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即人与人应该彼此主动无差别地相爱，其具体实施的内容是互利。有力量的人帮助人，有财产的人分财于无财产的人，有道德的用道德教化人。墨子认为，只要能够兼爱互利，那么，就可以消除战争，实现人人相爱的社会理想。

所以，墨子及其弟子多是具有专门知识的实干家。这种知识是为行动所需，是墨家人生的必备基础。虽说他们知识与行动的合二为一不像儒家那样注重人格的培养，但从本质上却也是一致的，都是实现其政治主张的必需修养。

中国文化这种行知合一的倾向，对于现代人，应该是不觉陌生的。知识不是只供谈论、只供追逐私利的工具，真正的知识追求和人生目的的实现是密不可分的。实用的知识也好，非实用的知识也好，应该是自我人格的补充和培养，如此，才能化为行动所必须的力量。

孔子说：“听到他说的话，然后去观察他的行动。”

孔子对行的注重告诉我们：行可以观察一个人的人格修养。缺乏这种修养，其人格的追求就值得怀疑，而他的行为也就会暴露出无意义性，高下尊卑便可一目了然了。

智慧与知识不同

墨子在器械上胜公输般靠的是知识，到后来，他预料到公输般的意图并提前已有安排，这便是智慧的表现了。

智慧是生命个体从心底对外部世界的感悟和自知，是属于“吾心自知”之境的。

所以，在中国文化看来，智慧是不能谈论的。像讨论知识那样去讨论智慧，本身就不是智慧。

这是因为求取智慧的历程是飞跃一切推论、超越知识羁绊后才会出现的境界。

王阳明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到后期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他先溺恋于侠士之道，沉醉于骑射之术，再徘徊于章句之乐和神仙之境，其一生可谓是求知甚广，旷达不羁。

据说，他二十一岁时听到朱熹的格物学说便很兴奋，通读了朱熹的著作。一次他和朋友一起讨论如何通过推究心外之物、达到心中之理的自我认识这一朱熹学说的修养方式时，两人对着庭院前的竹子试行起格物来。

他的朋友格了三天，即病倒了。他不灰心，独自坐在竹子前边，昼夜不停，但仍“沉思其理不得”，第七天也病倒了。

此后十几年，他几次研究朱熹学说，终于厌倦，未能从朱熹提供的知识框架中得以解脱。

他曾有过入山修道之念，未能实行，但确实练习了道家的“导引”之术。他之旷达不羁，求知甚广，或许可以说是困于知识之境而未能化解贯融之故。

知有所困，知识不能代替智慧，在王阳明，应该说是合于实情的。

因为得罪权贵，王阳明三十几岁被贬到贵州一个叫龙场的地方，途中差点死去。在龙场，历尽人生苦难之后，有天夜半静坐，王阳明突然悟到了格物致知的本旨。

这就是所谓的龙场悟道。

圣人之道，从个人的本性中就可求得。天下的事物本没有什么可以探究的，其格物之功，应在自己身上去做，平素一味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王阳明欣喜之至。他的心学之说“心即理”由此萌起，并以其对朱熹学说的反动独树一帜，成为继陆象山之后中国唯心说的先驱。

王阳明说：“心外无花。你没有此花的时候，就没有关于花的感觉，花便不存在。看见，感觉了，花才呈现。可见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它不能离开你的感觉独立存在。”

在主观唯心方面，王阳明确走得太远，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对王阳明，这却是一种全新的感觉。

抛开哲学之争，王阳明从格物竹林到龙场悟道，就其本人面论，他是完成了由求知到求得智慧的过程。

智慧从更深层次乃是对自己身外万物的重新解释和赋予自己新的眼光。它与知识不同。人们获得新知识，必须以已有的知识为基础，建立假设，然后遵循逻辑的程序加以推论，方可有得。而智慧的求得，则在于超越这些过程，排除一切思考的规则，直达目的。

关于此，庄子曾说过这样的话：“用世俗的学问来修治本性，以求复归本初；用世俗的思想来迷乱情俗，以求获得明达，这种人称为闭塞不通。以恬静涵养智慧，智慧生成，却不外在，称为智慧涵养恬静。智慧与恬静交相涵养，而和顺便从本性中流露出来。”

庄子告诉我们：迷于俗间的琐事中而不能自拔，是不可能求取生命的智慧的。

智慧需从生活中获得

禅宗在唐代由第六祖师慧能得以光大。佛教中，这一宗派亦产生于印度。由释迦牟尼传心法于迦叶，由迦叶尊者在印度传二十八代，第二十八代祖师菩提达摩于南北朝时经广州进入中国，开中国禅宗之始，被称为中国禅宗的第一祖师。

据说，释迦世尊在灵山法会上，将衣钵传给迦叶后，另一弟子阿难向迦叶尊者说：“世尊除传金兰袈裟外，还传什么？”

迦叶微笑着，突然大喊一声：“阿难！”

“是。”阿难一怔，胆怯地答道。

迦叶微笑着说道：“天晚了，去把寺前刹竿收起来。”

这个故事很可能经过中国禅宗改造，甚至是后来虚拟的也未可知。但它确实道出了佛义的真谛。

在禅宗看来，每人都有佛性，而所谓佛性就是自身的精神主体，求佛，就是求自身生命的智慧。

那么，如何求得佛性，即智慧呢？

禅宗认为应从平常心做起，从吃饭、穿衣等琐杂细节中去体悟。平常心即是道，像迦叶之于阿难那样，如果想从虚无缥缈的世界去找佛理，那是得不到的，佛性存在于生活之中，也只能从生活中去求得。

就这一点，禅宗对中国文化儒、道两家有所继承是无疑的。禅宗主张直指心性，主张用内心去体悟一切事物及自身自有的佛理。

禅宗六祖师慧能有这样的故事。

禅宗第五祖师弘忍召集弟子，当众宣布要下传作为继承法嗣的标志——袈裟。

他让每一个僧人写一首偈，说明自己对佛理的认识，最好者便是法定传人。

当时弘忍门下的上首弟子神秀，名声显耀，当即作一首偈题在壁上：

心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见此诗，别的僧人无人敢再题偈。这时，一个刚到寺院八个月、大字不识一个的杂役和尚，请人在壁上也题了自己作的一首偈：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弘忍大喜，当夜密传袈裟与他，并嘱其隐居远走。十六年后，弘忍死，混迹民间的杂役和尚，亮出袈裟，削发为僧，成为禅宗的正式领袖。

这便是对后世禅宗影响极为深远的慧能。

慧能从未正式学过佛理，拜见弘忍前一直以砍柴为生，并奉养老母。他见弘忍时，弘忍认为他是村夫，很为冷淡，因为在对话时慧能显出了对佛理的悟性，才被收为杂役和尚。后又十六年混迹民间。但正是这种凡俗的生活使他体悟了佛理，并完成了禅宗历史上伟大的改革。

慧能曾说：“领悟佛教的真理，要凭借每个人生来俱有的智慧，一闻佛义，顿时照见自己内心的佛性。”

他第一次把佛性交与凡人，认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人人都能成佛，佛就在人的本心，也只有在身内方能求得。所

以他主张不做禅，不念修行，而是去掉心中邪念，随时从生活中悟到智慧。

他讲经二十余年，影响遍及海内，连当时的皇帝都慕他的名声，召他进京，他托病不应。记载他学说的《坛经》不仅影响了禅宗发展，也成为后来宋、明道学家和许多士大夫所钟爱的书籍。

慧能的智慧得力于生活，得力于生活中每时每地的顿悟。这就是顿悟不仅成为禅宗的主要内容、也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大发明的原因。

慧能所启示于现代人的，是一种平易的生命智慧，那就是，对于生活的有心者，处处可有心得与智慧。只拘于常俗、只遵守习惯的思维和现成的教条，就会缺少灵性而被外在的惯性所驱使。求得智慧，只靠经验不行，只靠知识也不行，它应是经验、知识和富有创造的悟性的融合体。

得到智慧的秘诀在于忘掉知识

有人曾这样说：一切知识，对追求智慧者只是心灵磨坊里的谷子。一切概念都只有唤起感悟、引发共鸣的作用，只有把所有知识化成自己的血肉，培养出清澈的心灵，才能流露出活泼的智慧。

这是极有道理的。

死板地恪守知识训诫，心灵充满实在的技能，这样的人是得不到智慧的。

《庄子·秋水》有这样的寓言。

燕国寿陵地方的人，走路八字朝外，十分难看，有个青

年听说赵国人走路很好看，就跑去学习。

他学得太认真了，一举一动都牢记并模仿。结果不仅没学会赵国人的步法，连自己原来的步法也忘了，最后只好爬着回去。

这寓言虽有些夸张，但它旨在告诉我们，太拘泥于知识，必会被知识所困。燕国的青年人如能取赵人走路之长，融会于身，进而忘了自己是在走路，任心灵空明地恢复本性，是决不会爬着回去的。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真正的智慧不是满足于知识，而是忘掉知识。忘掉知识，直指心灵的悟性，才能得到生命的大智慧。这很像是禅家所谓：有人去问禅时，倒茶，溢出来还在倒。你如果有疑问，说：“师父，水已经满了，你怎么还倒啊？”

他就这样回答你：“你就像这只茶杯一样，里边装满了你自己的看法、想法，你不将自己的杯子空掉，叫我如何对你讲禅呢？”

应该说这是极富见地的。智慧需要的是心灵的至善和至净，而知识由于我们所常用，对我们的心灵已形成了难以摆脱的观念束缚。就观念而言，常不免是有固定的成见和本身的偏狭的。

关于知识，《庄子·天地》中有这样一个寓言。

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一。有次，他坐在堂上读书，一个正在做活的名叫轮扁的工匠问他：“敢问大王读的什么书？”

桓公回答：“圣人之言。”

轮扁问：“圣人还在世吗？”

齐桓公说：“已经死了。”

“那么你读的是古人的糟粕了。”

齐桓公大怒，让他说出理由，否则就斩首。

轮扁从容答道：“好吧！就拿我制车轮这手艺来说吧，要车轮坚实又要转动灵活，榫眼必须做得不差分毫。这功夫的奥秘，只能得之于心、应之于手。

这种熟练的技巧只能靠心神感受，说是说不出的。我不能传给我儿子，儿子也不能从我这学去。所以，我现在七十岁了，还得自己做车轮。

以此类推，圣人已死，他的精华是不能传下来的，那么，你读的自然就是古人的糟粕了。”

这寓言含有庄子虚无、相对的一面，但的确可以启示我们：生命的智慧——照庄子所说，即“道”——是只能自己去感悟和为自我所独有的，它不像知识那样可以传授，即使是能够传授，说不定已丧失了精髓、成为单纯的知识了。

这里，庄子是说：智慧——心灵的感悟，可传递性极其微小，它是从心灵的深渊之处，从清澈澄明之境而对生命本原的一种判断，一种微妙的组合和选择，它在与外部世界的重新融合后，满足的是生命的自我创新。

禅宗历史上，以“有问三十棒，无问也三十棒”而著名的禅师德山宣鉴，在没有皈依禅宗之前，以精通《金刚经》而著名于川内。

他后来听说南方禅学很盛，就挑着经疏，到湖南去挑战。在龙潭，他拜会了龙潭崇信禅师，说：“我向往龙潭；可是这里，潭也不见，龙也不见。”崇信禅师说：“你已经到龙潭了。”德山若有所悟。

禅坐夜深，出门时他感慨说：“外面好黑呀！”

崇信禅师说：“我给你火。”

但崇信给了他灯烛，却又一口吹灭了它。德山宣鉴从此大悟。第二天，他把带来的青龙疏钞在法堂上烧掉了，自此，随侍崇信禅师左右，后来也成为禅宗的著名师祖。

禅宗主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认为只有抛弃一切经书、知识，才能体悟佛性。宣鉴禅师烧经书、对知识取一概否定之做法固然不可取，但他的悟道却对我们有所启示：智慧生于自心，如崇信禅师给宣鉴的火。火只能在自己心中，当所依赖的对象存在时，就不可能有所悟，只有它消失了，自我潜在的光明才能得以发挥。

智慧的最大敌人是执着

困惑我们的，并不仅限于现实以及知识。

固然，我们有时候不过是命运的玩偶，但现实世界并不一定要求我们解释它的所为，我们所要解释的，是身处现实之中的自我灵魂。

据说，六祖慧能要求向他发问的人“把你未生以前的本来面目给我看”。

这实乃是无法予以回答的问题，慧能祖师亦不是让人回答，其意旨在破除我们内心的执着。

求取智慧，最大的敌人是执着，不论是执着于知识，执着于名，执着于利，执着于形体之美，执着于权威，只要一旦执着，智慧之门就对你关闭了。

对于执着的破除，禅宗曾留下许多著名的公案。

有一个姓杨的人离别双亲到四川去求菩萨。路上，遇到